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

□范玉刚

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编选的《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 论文艺》于2010年3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编辑出版的一部经典作家的重要文论文本，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须在实践中予以深刻领会。理解马克思文艺观的深刻内涵要有历史视野，其中，重要的一条路径就是回归马克思。回到马克思不单纯是回到经典作家的文本，更是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视野，毋宁说这种返回的步伐是迈向前进方向的，是进入新的历史语境回应时代的挑战。

当下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政治一体化已成为世界发展趋势，迎接我们的是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驱动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发生了变化，文化、创意在新的经济形态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凸显，甚至有学者断言 文化引导未来。在新的经济形态主导下产业越来越下游化，而人的需求和消费越来越上游化，社会形态越来越高端化。在创意经济、虚拟经济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的未来社会形态中，人越来越居于主导地位，也越来越注重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一个类存在物的人越来越能直观到本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文学、美学作为人生成为人的一个维度，并不远人，它就在人的本质生成中，马克思的伟大理想——彼岸世界的蓝图越来越昭示出某种可能的现实图景。这种着眼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指向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重新焕发生命力的历史语境，在文化生产力大发展的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前瞻性与批判性可以有效地应对现实的挑战。

当前文艺呈现多元格局，多种文艺样态并存，特别是文艺与数字化技术相交融生成很多文艺新业态，这不但改写了传统的文艺观念和存在格局，还以其强势和蓬勃的生命力扭转了人们看待文艺的态度，文艺新业态不再是传统文艺形态的延伸，相反，传统文艺形态要在文艺新格局中才获得意义和价值。这种视野的转变深刻影响了文艺理论研究的转向，马克思主义文论只有在转向中切近文艺现实才能拥有话语权。伴随文艺与生活的相交融、社会与文化的互文性，文学的界限不断模糊，文学的界域不断泛化，以什么样的观念来引领文学的发展，在文化凸显的历史语境中显得愈发重要。伴随文艺格局的改写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有可能迎来文艺理论的再次复兴，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其对人自身的关注在文艺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会愈加显示出不竭的生命力。新视野下的文艺新格局及其文学存在方式（新业态）的变化很可能会激活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生命力，会激发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深层思考。

当前在文学生产关系与以数字化引领下的文学（文化）生产力发展提供的诸多可能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以新视野新思维洞察文艺现实的变化，就会发现某些文学制度远远滞后于文学现实的发展，二者之间的断裂和敞开正是马克思主义文论发挥作用的场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和敞开性恰恰可以为文化体制改革提供思想资源。就世界发展趋势而言，21世纪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围绕文化生产力展开的，经济的就是文化的，文化的就是经济的，像《泰坦尼克号》 《阿凡达》既是电影精品也是带来巨大市场收益的产品；《哈利·波特》既是产生广泛影响力的图书，也是处于庞大价值链的中心环节的创意产品。创意、观念越来越重要，一个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创意者阶层，创意经济的引领正在主导未来社会的形态。社会越来越成为文化的文本，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表征。只有被视为社会存在，文艺作品才是现实的，它就必然要遵循生产——流通（传播）——消费的基本逻辑及其价值实现的过程，文艺作品的力量取决于多方合力的作用，只有在市场中被消费的产品才能发挥文化影响力，只有在社会性存在基础上文艺的独立性（审美性）才会显出它的力量，惟此必须重视对文学生产、文化市场的研究，正确理解文化市场何为。既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和机制，也要谨防市场失灵。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文艺从社会中割裂开来理解，而是在社会性的整体内涵中领会文艺的存在。

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效性还显现于它对现实的批判上。在大众文化流行的时代，文艺几乎被“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同构原则收编。与“西马”期望现代人的审美活动应走向与现实生活的非同一相反，这种巨大的审美差异资源正在被“同构”原则耗尽，审美愈益下坠为日常生活的粉饰、点缀，美在某些美学家视野中和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早已走出自律性审美模式，加入到追逐和欢呼感官欲望和虚拟视像的满足中。审美泛化、泛艺术的概念开始流行，并俘获大众的视听感觉和心理，审美、艺术从以前高于生活的膜拜对象成为当下大众日常生活中随意取用的消费品。审美、艺术依托高技术支撑下的互动愈发相互契合，不但改写了经典审美原则、艺术原则乃至文化格局，甚至已然改写文化与自然的界域。伴随文学多元化和观念的改写，“主体”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经由后现代主义洗礼，“主体”概念已被悬置，在很多语境下它仅是作为一种符号存在。但人又岂能离开身份而生活？ 1990年代后审美和文化通过现代传媒全面商品化，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文化现象，新一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批判矛头指向审美和文艺中充斥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化政治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运用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思想普遍出现于文化政治研究文本中。面对文艺越来越成为消费品而愈益丧失其社会性，不得不追问：文艺是人的感官欲望的消费物还是人性生成的一个向度？面对文艺为人服务成了为大众娱乐服务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论要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盲目排斥和粗暴否定文艺的大众娱乐功能固然不现实不明智，但如果就此将其强化为文艺的“唯一”价值，极力排斥和消解其审美、担当价值，一味追求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显然有失偏颇甚至有害。在快感主义的娱乐游戏中，审美的精神内涵被悄然消解，文艺活动更多地走向追逐娱乐游戏与狂欢，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被悄然替换成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快感，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能享受，传统理性主义范畴内的美感文艺，转化为后现代思潮下的快感文艺。当下文艺在娱乐化、游戏化中所导致的审美精神失落，不仅会造成文艺审美活动的异化，同时也将导致人性本身的异化。它有可能在人的重新发现、入的尊严和价值重新启蒙后，把人再次“物”化、自然化的危险，甚至导致人自身的异化。新的历史语境和变化的文学现实，恰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焕发生命力提供了现实机遇。在对当下文艺现实的揭示、批判与展望和筹划中，马克思主义文论要重构文化理想和审美观念，为文艺何为树立标尺，培育大众对文艺的敬畏感。

文艺评论

文化产品也变味

□许博渊

现在要想吃到天然有机食品真的是越来越难了。以我一日不可或缺的大米为例，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称心的品牌。有的大米价格不菲，煮饭时也确实有香气飘出，但吃的时候却感觉不到香味。后来才知道，那是用香精薰出来的。价格低一些的，煮好之后揭开锅盖的时候，会有一股农药的臭气进入你的鼻孔，虽然只是一刹那的功夫，也足以让人胆战心惊。变味的不仅是食品，连文化产品也不能让人放心。

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如今在中国很出名，因为他去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当中国统治世界》，观点新颖，道人之所未道。今年，这本书的中译本在国内出版了。有一天我在书店偶然发现了它，就顺手买了下来。作者专门为中译本写了几句话放在卷首，叫做《献给中国读者》，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希望中国读者能从这部书里获得激励，以引导你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帮助你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这场辉煌的历史巨变所带来的极其重大的意义。 我觉得味道不对，哪有一个作者会如此傲慢，会说自己可以引导读者，帮助读者理解之类的话？心想这个英国人也许是李敖、辜鸿铭一类的人物。

我疑疑惑惑地翻过一页，发现这几句话的英文原文就印在背面，仔细一看，我发觉错怪雅克先生了。他的原文是这样的：

I hope Chinese readers will find it stimulating and thought-provoking as you seek, lik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the broader significance of the extraordinary historical changes that are taking place in your country.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这样：“我希望中国读者像世界其它地方的读者一样，能发现此书对于理解那些正在你们国家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历史性变化的更加宽广的意义具有刺激和促使人思索的作用，正如你们所企求的。”他只是说他的书可以刺激读者去了解，能引起读者思考，而没有说他有这个能力去引导和帮助读者理解。他这样说没有错，因为该书在英国出版以后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确实刺激了人们去理解中国变化的意义，也促使人思考这个问题，而作为一本著作，这种特点的确也是读者所期盼的，一点都不过分，不过如一道开胃菜，刺激食客的食欲。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中译本的译者要作这样的处理。除变更语意之外，译者还不负责任地丢掉了一些句子成分，如“像世界其它地方的读者一样”和“正如你们所期盼的”。而且，译者对英文词作了随意的翻译，如“更加宽广的”被毫无道理地译成了“极其重大的”。雅克的意思是，中国的变化不仅影响到中国自己，还将影响到全世界；不仅影响到现在，而且还将影响将来；不仅影响到经济领域，还将影响到政治和文化领域。他的这一层意思，显然不是“极其重大的”可以概括的。雅克用词有他的道理，而译者没有理解，落笔太随便。

一开头就读到这样的文字，使我立刻联想到一锅刚刚煮好的米饭，一开锅盖就闻到一股农药味。书的正文无法核对，但我安慰自己，总不至于太离谱的，因为据书上介绍，译者是一所名牌大学的博士生，英语八级。尽管如此，心里已经留下了疙瘩。

这里恐怕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翻译的理念问题。传统的做法，学术著作和政治性著作的翻译，把准确放在首位，绝不能像翻译文艺作品那样，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再创造。有时候为了准确传达原作者的意思，宁可稍微不顺一点。这个传统现在是否被丢掉了？另一个是作风问题。听说现在翻译一本书很快，往往两三个星期就送印厂了，哪里还有字斟句酌，为一个词可以沉吟半天的？时间就是金钱！

不过，失望是大可不必的。历史的总趋势总是向前的。我相信，到了全国人民在物质上都达到富足的程度之后，人们就不会视钱如命了，就会追求精神上的东西，如荣誉感、成就感、使命感、责任感等等。到那时，我们一定可以享受到纯真美味的食品和文化产品。

侦探们要寻求什么

□汪立冬

侦探小说这个类型自从诞生以来，本来就经久不衰；而在那么众多的侦探小说作家中，也只留下了数十个名字；在这数十个人中，读者们最津津乐道的又还是那几个人：柯南道尔、阿加莎·克里斯蒂、江户川乱步……而能被封上桂冠的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了。9月15日是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诞辰120周年的日子，全球的阿婆迷们都在准备迎接这个纪念日。

为什么她的作品能够吸引那么多代、那么多数量的读者为其痴迷而沉吟至今呢？最显见的原因恐怕是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在以文字阅读为主要消遣的时代，读者在床头、桌案边、草坪上、车厢中、剧院里、收音机旁，观看或收听了克里斯蒂为他们编排的一个个精巧的谋杀案。即使到了影像阅读占据主导的今天，虽然很多人是先看了大卫 苏切特饰演的波洛或杰拉尔丁·麦克伊万饰演的马普尔小姐的经典剧集，然后才找到小说来读，那一定也自觉地不再看更多的影视改编，而宁愿耐着性子先看文字作品。为的就是让速度放慢，自愿陷在作者故布的疑云中，等待最后云开见日的一刹那。胃口吊得越足，好奇心就越强烈，最后，出人意表的谜底出现时，也就越能让人有阅读的满足感。克里斯蒂的作品非常擅长此道，正如她在《大象的证词》中借侦探小说作家奥利弗夫人之口所说，“她是个幸运的女人，创造了一种愉悦的写作窍门，让众多读者所喜闻乐见”。但是仅凭此一项就足以造就那么多阿婆迷吗？

伟大的侦探波洛最酷的一句话是：“我的朋友，事实是这么简单！”业余侦探马普尔小姐也总是从容地说出：“哦，她就像圣玛丽米德村的某某，你看，事情总是这么相似。”的确，犯罪的动机总是那两个——金钱和情感——这两个与人的欲望最相关的东西。那么，每一个案件背后都有人性作祟，两位侦探说的最多的词也是“人性”。我喜欢看克里斯蒂笔下那些生活在英国乡村的鲜活人物，他们庸庸碌碌，谨小慎微。在作者的叙述下，每个卷进案件的人又似乎都有嫌疑，因而显出了人性阴暗的一面。但是凶手被揭露后，被排除嫌疑的其余人等其疑点被揭开时，他们就会在读者面前显出善良、勇敢、可怜的面目。和生活在乡村的人一样，大都会里的绅士名媛们也会为遗产和爱情与竞争者争得不可开交，甚至每个人都有杀人动机，可是，往往真相只有一个，凶手也只有一个。这些嫌疑人的作用不仅是障眼法的法器，也是人性之旅的领路人。就拿《魔手》来说，小镇上每个人几乎都收到匿名信，而信件内容或多或少都能够捕捉到一丝风影，是人性中本身的缺陷甚至罪恶让人们不再光明磊落地看自己、看别人，魔手就是人性本身。在小说的9/10处，少女梅根还是最大的嫌疑人。尽管各种暗示都指向她，但读者不愿意相信凶手是她，这是因为，读者希望表面的纯真下，是真正的无辜。幸运的是，马普尔小姐的眼睛是雪亮的，她要寻找的是真实的善与恶。

凭借着这种对人性真实的刻画，克里斯蒂的小说其实已经脱离了通俗小说类型化、脸谱化和一味吸引眼球的倾向，这也是她的作品吸引众多读者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她的大侦探波洛要寻找的不仅是一种合乎人情的事态，更是一种符合逻辑的秩序。也就是说，她的小说让逻辑闪闪发亮，读者先求得真相，再求得真理，获得了求真的满足。波洛在掌握各种信息后，最常做的动作是，舒舒服服地坐到椅子里，动用脑中的灰色小细胞，梳理各种信息，就像搭积木那样，把每个信息的木块儿放到合理的位置，直到搭建成一个没有漏洞的圆融整体。这时，真相就大白了。

克里斯蒂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在她的一生中，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也许，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但能从她的作品中看出，她还是留恋过去的世界。马普尔小姐不无忧伤地看到：她住了大半辈子的圣玛丽米德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样子了。“当商店易主时，店主使它无节制地现代化” 超市也让老太太们望而却步，“新建住宅区（Development），它有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以及用大写字母开头表示的象征含义——‘发展’”。也许在克里斯蒂眼中，发展和现代化意味着要颠覆以往的价值观，宁静的乡村没有了 人内心的平静也没有了，罪恶增多了，在小说中，谋杀也增多了。作者想用写侦探小说的方式寻找让世界重回平衡的秩序，这样的秩序不仅涉及“真”的层面，也涉及了“善”的层面，也就是说，侦探们的行动最后要落到价值判断上，他们最终要寻找的是正义。所有谋杀，无论设计多么高妙，无论动机多么引人同情，它还是谋杀，是违背人伦的不义之举，终归是要受到审判的。也许读者喜欢波洛，就是因为在他自负骄傲的外表下，有一颗善良和坚持正义的心吧。

《唐山大地震》的震撼

□曹 楠

一场大地震，一座城市被夷为废墟。一块巨大的水泥板把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压在了两端，救活一个的代价便是牺牲另一个。母亲在情急与无奈的情况下绝望地选择了救弟弟，于是一家四口因为这23秒的地震开始了长达32年的生离死别。这便是冯小刚导演另一佳作《唐山大地震》的剧情，正是这样的一部电影让国人在这个盛夏备受感动。虽然本影片只选择了唐山大地震中一户平凡人家的境遇，但普通人家、市井生活，个人心灵的余震和特殊亲情的重建背后却渗透出多层面的人文价值，也因此最能感动读者、催人泪下。

人的生命在自然面前是那么脆弱和渺小，除了珍惜生命我们别无选择。电影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死了的人死了，活着的人就得使劲地活着”，使劲地活着或许给出了答案，那便是珍惜生命，活出精彩，把拥有生命的每一天都活得有滋有味。

影片折射的另一价值便是浓浓的中国式亲情，这也是最打动观众的原因。父母在危难时刻不顾及个人安危去救自己的双胞胎，丈夫在生命最紧要关头拉了妻子一把从而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妻子自己却长眠于地下，母亲为了丈夫和女儿能找到自己的家一直不肯搬进新居独自抚养儿子苦守了32年，这便是家庭的力量、亲情的力量。在亲情的支配下，亲人之间可以忘我、可以无私甚至奉献自己的生命。中国是以家庭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国度，同样也是最注重家庭伦理的地方，亲情对于每一位华夏子孙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废墟之下，时光之上，亲人永远是亲人”，灾难之中最显亲情之力量，但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检验亲情的意义。当家庭和气一团，关爱每天环绕时，有些人或许已经习惯并不觉它的重要，而这部电影恰恰让我们体会到了，一旦失去亲人便意味着什么。因此当我们在安享家庭之乐的同时不妨扪心自问，是否真正尽到了对家庭和亲人的责任，夫妻之间是否做到了恩爱与真诚相对，父母在忙工作的同时是否忽略了孩子的感受，子女是否做到了体谅孝顺父母，人心自有一杆秤，不妨也秤秤自己。

对于在灾难中逝去的人，我们又当如何呢？如何慰藉逝去的人从而更好的抚慰活着的人呢？在电影最后一分钟，68岁的宋守述老人站在唐山遇难同胞纪念墙前，凝视着墙上5岁儿子的名字，呢喃道“过两天再来看你，”然后骑车离去。那身影透着一种被压抑的悲伤，也渗透着伤口被日渐缝合的希望。在唐山大地震中有24万同胞遇难，为了纪念他们，唐山在长300多米、宽9米左右的大理石纪念墙上镌刻了他们的名字及纪念碑文。名字是一个人的象征，尤其是对于那些连尸体都没有找到的罹难者，纪念碑上的名字就显得格外有意义，这些镌刻的名字既是遇难者来世上活过一次的见证，更是对他们的尊重和缅怀。对于故去的同胞，社会确实应该还他们尊重和体面，而不是用一个笼统的数字集合一笔带过。对逝者的缅怀到底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宗旨一定是把每一位遇难者当做独立的个体，给予充分的尊重。

在灾难面前，什么是最可爱的，什么是能抵御灾难的良药？那只能有人性的光芒，是人间大爱，是唐山救援队出现在汶川地震上的感恩意识，是面对灾难中国人特有的“中国精神”，是全体社会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与众志成城的团结精神。今年又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面对那些正在洪水、泥石流灾害中的民众，面对那些不幸遇难的同胞，除了及时地伸出援手，我们还应该做点什么呢？如何才能提高灾难的预警准确度从而把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如何才能在救援中做到最大限度的帮助受灾群众？如何在灾后帮助灾民渡过难关做好心理重建？这些都是需要每一位国民应认真思考的。

消费与阅读

□路文彬

法国学者波德里亚说过：“消费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生产功能。 可是我认为，这里的生产却同时也是一种消费行为；它是对于地球有限资源的无情损耗，是为了满足消费而进行的非享受性消费。不过，话又说回来，归根结底，消费的旨归还是不可能真正偏离开消费。创造虽然难免有所消耗，但其消耗要远远小于它对于这个世界的给予。从根本上说，创造是对消耗的消耗，通过这种消耗，它保留了丰富。换言之，创造是拒绝依赖的自由能力。将消费等同于创造的论调，致使丰富成了肉眼可见的量的形式，它掩盖了背后精神的贫困。这是一种虚假的繁荣，是进步的幻象，它因透支得来，必然导致亏空的灾难。

消费主义掌控下的文学现状，就是写作已不再是创造，而只是消费性的生产；为的是产品流通之后无限的利润。这一宗旨要求作家首先是写的更多而非更好，结果，写作的速度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过去的作家那里，是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时间完成的问题；在今天的作家这里，则变成了一年可能完成几部长篇小说的问题。作家之间展开的是一场体力上的比拼。落实到阅读上，阅读也同样变成了纯粹的消费。打开作品，是为了有趣和放松，而不是期待着思考与启示。这和上一次按摩院没有多大不同，略有差异的只是一个是为了身体上的放松，另一个是为了让心灵获得放松。放松之后即是迅速地遗忘，按摩不再同我们相干，作品不再同我们相干。只有等到再度疲惫无聊的时刻，我们才又会想到按摩、想到作品。但要命的是，此种文学的按摩永远不可能令我们真正摆脱掉疲惫无聊，而只不过是让我们对其滋生出永久性的依赖；提示着疲惫无聊对于我们身心的终生束缚。

这一时代的消费性阅读既无法使我们独立，又无以令我们成熟，它只是让我们以尽可能快乐的方式放纵着自己对于文字的任性。阅读行为本身不再是对读者提出要求，而是对作者提出要求。也就是说，写作的中心不再是作者，而是变成了读者。真正的创造者不是作者，乃是读者。作者呢？他仅仅是个服务者。如果没有读者的需要和买单，那么作者便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过去，写作或许是一种自恋的形式。在今天，阅读才是一种自恋的形式。不客气地说，正是消费主义自以为是的享乐动机在毁灭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和阅读。既然阅读已然失却既往的意义，那么写作同样也不会摆脱掉这样的命运。

随想录